

论涉外旅游中的文化再生产与文化涵化

——以云南丽江为例^{*1}

撒露莎

(中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

【摘要】:在涉外旅游场域中,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涵化并被再生产、再创造,是一个一再发生的事实。涉外旅游的文化涵化过程,表现为替代、融合、同化、隔离、复兴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都是深度的文化涵化表现。丽江作为涉外旅游的一个主要地区,其传统文化在中外跨文化的旅游场域中,通过积极的交往与互动、体验与欣赏、合作与共融,消极的偏见与冲突等形式,实现广泛深入的跨文化交流,表现出传统文化再生产与文化涵化的典型性。不少经过涵化后的文化已成为一种新文化、新传统,不仅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涵化产生较大影响,而且东道主文化对游客也有涵化作用。通过云南丽江的例证,阐释了涉外旅游如何影响传统文化再生产并带来旅游目的地文化涵化。

【关键词】:涉外旅游;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文化再生产;文化涵化;丽江

【中图分类号】:F5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7)03-0074-05

近十多年来,我国许多开展民族旅游的地区,由于其良好的民族文化资源,不断吸引海外游客,有的甚至成为我国涉外旅游的重点区域,如云南大理、丽江,广西桂林、阳朔等地区。海外游客数量的大幅增长必然带来中外民众间直接、间接的交往,跨文化交流已成为这些民族地区的常态,也成为影响这些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因。因此,加强旅游场域中跨文化交流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显得十分紧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文化再生产与文化涵化

“再生产”是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概念,是对社会文化形成过程的概念表达。他指出,文化以不断被“再生产”的形式传承、变迁和发展,通过“再生产”维持社会平衡和延续。文化的再生产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制,而是既定时空内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形成默契和认同的结果^[1]。文化再生产理论是其实践理论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应用,在他的实践概念里,实践是沟通客观社会现实和主观能动性的中介,也是沟通结构与能动者的中介。在实践理论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持续的文化再生产,推动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使人类社会文化变迁成为现实。

涵化是文化人类学的特有概念,是人类学对发生变化、变迁的文化的一种解释性词汇。学者对涵化的界定有所不同,一个基本的解释就是,涵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变迁是文化涵化的核心内涵,具体是指不同文化之间在接触、互动过程中,一个文化从另一个文化获得新的文化元素,导致自身文化从内涵到形式发生变迁。涵化不是临时性社会行为,而是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

¹收稿日期:2017-0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外跨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再生产研究”(GSY16015)。

作者简介:撒露莎,女(回族),中南民族大学讲师,民族学博士,主要研究民族文化、旅游人类学。E-mail:027abcdefg@163.com

人类学家弗斯特(M. Fortes)指出:“文化接触不是一些文化元素从一个文化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而是不同文化集团间互动的持续过程。”^[2]

最早使用涵化一词的是美国学者鲍威尔(J. W. Powell),他在1880年所著的《印第安语言研究导论》中论及涵化的力量造成了土著文化巨大的变迁。他认为,文化变迁基于发明和涵化,当一个发明被接受和被别人使用就是涵化^[3]。博厄斯在其《美洲神话学的成长》(1896年)一文中讨论北太平洋沿岸印第安民间故事的散布时指出,不同部落的涵化,其结果使他们大多数的文化特征变得一样^[3]。比(R. L. Bee)在其《模式与过程》一书中提出了涵化的几个特点:第一,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种。第二,涵化是有别于传播过程、创新、发明和发现的一种变迁过程。第三,涵化概念可用作形容词,如“A集团比B集团更涵化些”^[4]。研究文化涵化涉及到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文化的接触情况,不同文化间的连接关系,产生文化涵化的过程等。文化系统方面,各个文化系统作为一个独立单位而存在,有赖于保持界限机制、内部结构的灵活性和自我完善机制。一般来说,有较多的保持界限机制、严格的内部结构和有效的自我改善机制的文化系统,在涵化中变化较小,反之则容易发生涵化。文化间的连接、接触,一般是发生在互相建立联系的族群之间和族群的个体之间。文化的联系是人而不是文化本身,没有一个人或群体能够向别的群体的成员显示出他们的文化的整体,也没有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能够全面地处于涵化状态之中。因此,文化涵化总是局部的。

二、丽江的涉外旅游与跨文化交流

这里所谓“跨文化交流”,是指民族旅游场域中外国游客与中国东道主之间的互动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交往交流。中外跨文化交流带来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为了吸引海外游客,旅游目的地政府与社会有计划、有意识地对本土社会文化进行建构甚至重构,从而形成较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

自1977年美国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瓦伦·L·史密斯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出版后,对东道主和游客的研究就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二元^[5]。旅游场域中的主客互动,自然也是跨文化互动和交流的基本结构。在这个互动中,体验与欣赏、误解与偏见、理解与交融、合作与发展,对于主客双方,都是实际发生的现实存在。从消极与积极的角度说,体验与欣赏、理解与交融、合作与发展是互动的主流,误解与偏见是主流中一些不和谐的杂音,并且,随着交流互动的广泛深入,误解不断被解除,偏见渐趋理解与宽容。旅游为不同族群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和平交往时空,不同族群的人们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绝佳的交流、交往、交融的机遇。或许,这就是跨文化旅游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旅游堪称当今世界和平的使者和通向人类美好大同世界的理想桥梁。

丽江是涉外旅游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来丽江旅游的外国人每年都在数十万以上,近年更是突破了百万。据统计,2014年,丽江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达2663.81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107.7万人次,旅游业综合收入378.79亿元,其中旅游外汇收入40578.98万美元。2015年,丽江市接待海内外游客3055.98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114.54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47853.36万美元^①。丽江较大规模的涉外旅游,为当地带来了广泛的跨文化交流,并使之具有中外跨文化交流和东道主文化涵化的典型性。丽江地区广泛的跨文化交流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

第一,交往与互动。这是外国游客在丽江的基本活动。外国人在丽江的活动有很多,包括政府官员的访问,专业人士的项目合作,学者们参加学术会议,大学生的交流,志愿者的工作,浪漫人士的寻梦,当然,更多的是游客的旅游。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来到丽江的外国人都有一种游客的身份,无论他们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工作完成之余,都会有一番考察或者漫游,来到丽江,他们都是游客。因而,交往与互动是外国游客在丽江的基本活动。从性质上来说,外国游客在丽江旅游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是一种正能量的积极交流,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互传播。

第二,体验与欣赏。这是外国游客对丽江的基本态度。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来到丽江,首先是作为游客对其所选择的旅游目的地的亲身体验。在体验中互动,在互动中获得旅游的感受。在丽江,欣赏是外国游客的普遍感受,欣赏丽江人的淳朴,欣

赏丽江的传统，欣赏丽江的文化。作为在丽江生活和工作十几年的美国人 Peter 夫妇对丽江的感受和体验非常有说服力：“纳西人太好了，他们非常热情、能干，非常的遵守道德，有礼貌。他们会邀请我去家里吃午饭，在嫁姑娘的时候让我帮新娘背嫁妆，他们教我怎样带孩子，在孩子掉进水沟的时候把他们拽出来，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严肃责怪，他们对待我们的孩子就像对自己的孩子。”

第三，合作与共融。这个方面的中外交流更多地表现为政府和民间组织层面，常见的形式包括缔结友好城市、邀请政要访问、中方人员出国宣传、中小学生互派、合作开发项目、学术研究交流、民间团队互动等。每年丽江市政府可以就这种类型的交流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第四，偏见与冲突。旅游场域中外国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误会、误解、偏见乃至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原因除了交往、沟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沟通不畅、沟通不足之外，更多的是族群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一致造成的。

从东道主方面来说，东道主对于外国人来丽江，基本都持欢迎态度。笔者采访古城管理所工作人员，当问到是否欢迎外国游客时，古管所工作人员回答：“中国游客和外国游客都一样，我们是非常欢迎，因为丽江是旅游城市，就必须更开放，不分国籍、民族、文化，必须是这样，不然就没有办法去做旅游，旅游给我们当地居民带来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东道主与外国游客的互动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作为东道主，一般都很乐于与外国游客互动，互动的方式主要用简单的外语配合肢体语言或者辅助工具，比如词典、计算器等。当然，如果是较为专业的东道主，比如旅行社导游、商店和酒吧服务员，甚至商店和客栈老板等这类人，他们的外语程度，尤其是英语程度会比较高，能作更深度的交流。

二是东道主大多都有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感，愿以热情好客的主人身份表现对外国友人的热忱、友好和欢迎。对于不同的外国游客，他们基本能做到一视同仁，并没有歧视的心理，也不会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但相对而言，由于西方游客更为明显的体质特征，东道主们会更加主动地向西方游客示好和交流。

三是在与外国游客的互动中，东道主普遍对他们表现出好感，欣赏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包括文明的举止、礼貌的语言、良好的卫生习惯、严格的自律、对他人的尊重、良好的诚信等；崇尚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生活取向，比如对旅游点的选择，旅行的方式如徒步、背包行、自行车、探险、自由行，以及随性的生活起居等。

四是东道主的这种互动模式，既有中国人普遍的好客文化积淀，更有纳西文化、丽江文化特有的文化内涵作为底蕴。东道主与外国游客互动，是中国人、纳西人、丽江人与外国人、西方人的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也是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纳西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动。

三、涉外旅游下丽江的文化涵化

文化涵化表现在不同文化的接触方面可能是直接的文化传播的结果，也可能由非文化的原因所引起，比如生态和人口的制约。显然，在丽江的文化变迁中，就外国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影响来说，生态和人口不是主要的因素，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是影响土著文化涵化的基本原因。文化涵化总是局部的、部分的，这是文化接触的方式和性质决定的，并因此体现出文化涵化的特点。

丽江在旅游场域中的文化接触特别是中外文化的接触中正是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在丽江，外国人及外国文化与丽江人及丽

江文化之间的接触，主要通过个体接触或者小群体交流来实现，但虽然只是小规模个体之间的接触或小群体之间的接触，它所代表的却是两个文化系统之间的接触，是文化涵化的必然路径和有效形式。由于这种接触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进行，这种路径和形式所带来的文化涵化的能量和效果，往往远大于同类文化系统之间或者同个文化系统内部不同亚文化之间文化涵化的能量和效果。因而，尽管在丽江的国内游客人潮涌动，占绝大多数，对丽江的文化涵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绝对不能小看占游客少数的外国游客对丽江文化涵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今天看到的遍布丽江街巷的现代酒吧、迪吧，随处可见的外文指示牌，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特色纪念品、各种饮料食物，飘荡在古老青石板街道中的外国音乐，无不是这种文化涵化的具体体现。

民族旅游促进跨文化交流而产生的文化涵化必然会影响到旅游目的地民众的个人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节庆习俗、社区组织等方面的变化。有学者指出，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就是“对人的影响”，是旅游地居民与旅游活动的直接、间接联系而产生的影响^[6]。旅游开发成为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催化剂，当今丽江人的日常生活、社交方式、价值观念、族群意识等都与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跨文化交流推动的文化涵化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外国文化对东道主文化的涵化，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传递和结合，使本土文化新增一些外国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元素，比如西方文化中的肯德基、麦当劳、可乐、啤酒、西式面包、酒吧、迪吧、外文标识、外语问候语、外语化口语、外文广告画、外国旅游纪念品、洛克故居品等，充斥着丽江的大街小巷，乃至星级宾馆、高尔夫球场、度假胜地，以及随处可见的金发碧眼、各式装扮的外国人等等，这些都成为丽江旅游场域中醒目的异域文化元素。这些外国文化元素虽然不是本土的传统文化元素，但因为旅游的推动，已经成为丽江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游客感受和体验丽江旅游文化的一个亮点和兴奋点，不可或缺。这一切，都是在丽江特定的旅游场域中，由于跨文化的交流传播而完成和实现的。坐落在风景如画的丽江玉龙雪山东麓甘海子的玉龙雪山高尔夫俱乐部，是北半球唯一的雪山球场、全球海拔最高的球场之一，因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人文景观别具一格，加之一流的球场设计、建设和项目管理，成为中国最具特色的高尔夫球场。可以说，玉龙雪山高尔夫俱乐部是一个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代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已成为丽江旅游文化的元素。它是丽江旅游场域中特有的文化涵化的产物。在丽江，许多经过涵化后的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新的传统，这些新文化新传统在丽江的旅游文化中比比皆是，已经是游客眼中丽江文化、纳西文化自然的组成部分。没有了这些新文化新传统，在游客看来，丽江就不是他们寻梦中的丽江，甚至不是真正的丽江。

东巴文字从宗教文字演变为民族文字或者被认为是民族文字，就是一个新传统、新文化衍生的典型个案。在采访中，东巴文化研究院领导Z先生如是说：

东巴文字是一种宗教文字，而不是纳西民族民间使用的文字，所以叫东巴文字，不叫纳西文字。它只是用来记录东巴经的，这种文字的价值在于有认知的价值，即我们通过这种文字来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认知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它不是民间的文字，用这种文字去记录纳西语言是做不到的。这种文字如图似画像动物，看起来很美，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可用作装饰等，但这仅仅起到了一个装饰作用和观赏作用。如今古城很多铺面挂牌上标注的东巴文，我们也不认识，东巴们也不认识。包括古城里面很多东巴在卖的东巴纸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巴造纸而是外来的造纸，被冠名而已。旅游开发后，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东巴文化，宣传的面更广，对东巴文化进行保护和利用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的游客中，老外来看文化的偏多，有很多是来认真了解文化的，而很多中国游客就纯粹是来游玩的，对于东巴文化就是觉得欣赏着很美就很满足了。

Z先生的谈话说出了一种现象，在目前的丽江，本来是东巴使用的宗教文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艺术品，一种纳西族文化的标识，成为游客眼中的纳西文化、丽江文化的代表，成为丽江的新传统，这是丽江旅游中文化涵化的结果。推动这种文化涵化的，主要就是游客，包括外国游客，是游客包括外国游客的猎奇、幻想和追求造就了这个结果。

同样的情况在传统节日文化中也很具有代表性。丽江古城M先生说：

七月半，是这里比较大的节日，和过年差不多。农历七月十四送祖时(接祖时间是不统一的)，要到古城里去放河灯，河灯我们不买，我们是自己做。但现在的游客是买河灯放，放一个河灯许一个心愿，把这个节日活动变成为一个天天如此、全年都有的旅游产品、旅游项目了。

纳西族七月半，在每年农历的七月十二一十四日举行，纳西语称为“包祭”，意为烧包祭祖。本是一个祭祖敬神的节日，一年一次，现在变成了天天开心的浪漫节日，甚至是情人的节日，传统变迁了，文化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这是文化涵化的结果，是外来现代文化、婚恋文化乃至西方浪漫文化涵化的结果。

大研古城居民成分的变化也很能说明问题。早期的古城居民绝大部分是纳西族，随着旅游的发展，古城的纳西族居民不断外迁，及至目前，古城里面已经基本没有了纳西族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少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老板成为古城的新主人，纳西族的古城和非纳西族的居民共同构建了新的大研古城，形成新的古城文化，活脱脱就是一个文化涵化的例证。古城七一社区领导 L 女士就说：

我是一直不想搬，一直坚持到现在，最近才搬出来的(才十多天)，我不想出租房子、不想搬的原因是因为古城人都走完了。我住的八一下段原来有 238 户居民户，现文巷就有 195 户，但现在从巷口到巷尾只有几户原住民，现文小学门口有一户，另有一户有一个百岁老人所以没有走，还有一户有房子纠纷，现在就只剩这 3 户没有走出去，不过他们也即将要走了。八一下段也还有几家，加起来最多也就十多户，也是由于家庭纠纷，或者没有租房等原因没有搬出去，关门口还有两家没有走，崇文巷可能也就七八家没有走。

丽江的文化涵化与变迁，在外国人眼里也是很明显的。在丽江经营酒吧“万子小坊”的韩国老板 NAN 说：

有很多人把古城里的房子卖给外地人了，因为可以赚钱，一些外地有钱人或外地公司把古城里的房子买下来了，说不定再过些年古城就不会再‘古老’了，会被外地人打造成非常现代化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越来越感受不到纳西文化了，如今在古城里只能看见一些现存的古老的纳西族房屋和一些穿着纳西族传统服饰的老太太们，年轻人早已经不穿纳西族服装了。我觉得老外会影响丽江人的生活方式。

旅游场域中的文化涵化也存在于游客一方，东道主文化对游客也有涵化作用，在丽江从事语言研究工作十余年的美国人 Jaque 谈到：

我不喜欢古城，现在变得太多了。自 1996 年地震后就变得不认识了。我们刚来丽江时，古城的商业化并不严重，纳西人都住在古城里面。他们生活很自在，那时的古城美多了。我们一家从没在古城里住过，我非常不喜欢古城，因为那儿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我怀念地震前的丽江，就像我小时候住的家乡一样宁静。在我们搬到现在的房子之前，我们全家一直住在玉龙县黄山镇白华中心村，在那里学习纳西文化。我们和当地人一起生活，看他们种些什么，何时收获，有时村民也邀请我们一起劳作。任何一种文化都随时随地因交流和交通带来的外来文化而发生着变化，美国文化如此，中国文化如此，纳西文化也是如此，纳西文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太多太多，我们自身也被不同的文化影响着而发生改变。中国的文化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如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等。“使用另外一门语言时想做到礼貌和友好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得罪人或产生误解确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我相信我们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哪怕是一个动作，在当地人看来都会是非常奇怪的，他们也许在想‘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当然，认识我们的朋友，他们了解并理解我们，就算有时冒犯了他们也认为是无意的。这就是文化冲击。

四、余论

通过上述案例的分析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自然会发生文化的涵化。涵化过程包括文化不同特质的相互影响，产生文化融合和文化同化，也可能出现文化的复兴。涵化后的文化会以一定程度的新的面貌出现，表现为原生文化系统中的构

成要素与外来文化的显性特质形成交融，或者新的文化要素被引入原生文化体系当中带来原生文化的新面貌。

丽江以独特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闻名于世，今日所见的丽江文化、纳西文化其实也都是历史以来国内不同民族在互动过程中文化涵化的结果。如今，年均百万外国游客入境使丽江作为旅游目的地增加了许多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特质，这对丽江文化、纳西文化的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

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游客的文化通常是强势文化，一旦旅游地居民与游客的接触交往成为常态，受到游客的影响就是必然。尽量满足游客的需求是目的地发展旅游的一个重要驱动，为了迎合、招徕游客，目的地社会以游客的文化标准来开发其原有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与游客文化的相似性，从而导致旅游地传统文化的弱化和当地生活方式“全球化”。另外，游客的衣着打扮、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对目的地居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示范效应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按照旅游仪式论的观点，游客在旅游场域中处于仪式过程中的“阈限”阶段，其行为特征表现为脱离日常生活结构化的规范，处于放松状态下的任性与随意，与旅游目的地结构化的日常生活成反向碰撞，因而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社会效应^[7]。也正因如此，不少学者对旅游的负面影响较为关注，少数学者甚至把旅游看作摧毁文化真实、破坏社会一体的主要因素。云南旅游包括丽江旅游，近期连续出现的负面新闻正是这种负效应的表现，这个问题值得旅游目的地政府及相关单位认真思考。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涉外旅游场域中，民族传统文化被涵化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传统文化再生产也是一个一再发生的事实。在欢迎并推动文化涵化积极影响的同时，正确应对传统文化涵化的负面影响，坚持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原则，坚持旅游开发中文化再生产必须遵循的规律，防止传统文化被过度现代化，应该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参考文献:

[1]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 [M]. 包亚明,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 R Beals. Acculturation, Anthropology Today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627.

[3] 黄淑娉, 龚佩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216.

[4] R L Bee. Patterns and Processes,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ical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Sociocultural Change [M].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4:96—97.

[5] 瓦伦·L·史密斯. 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 [M]. 张晓萍, 译.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6] Mathieson A, Wall G. Tourism:Economic, Physical and Social Impacts [M]. Harlow:Longman, 1982.

[7] 纳尔逊·格雷本. 人类学与旅游时代 [M]. 赵红梅, 等,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378.